

胡鞍钢 著

根据麦迪森的数据，

中国已在 2009 年超越了美国？

中国需要参与到绿色革命中，

从黑猫发展转变成绿猫发展。

只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一定会达到绿色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 的 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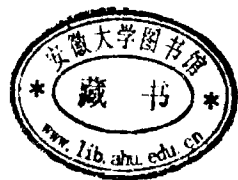
胡鞍钢 与 世界对话之二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的位置

——胡鞍钢与世界对话之二

胡鞍钢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位置：胡鞍钢与世界对话. 2/胡鞍钢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 5

ISBN 978-7-5473-0483-9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概况-文集 ②公共政策-中国-文集 IV. ①D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9498 号

中国的位置——胡鞍钢与世界对话之二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300 千

印 张：20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83-9

定 价：33.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告诉后代:中国经济腾飞的故事 /1
中国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 /10
中国减排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19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28
中国地区差距及城乡问题 /36
中国绿色发展与政策 /44
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 /48
中国农村电网与绿色能源 /55
中国发展与中美关系 /61
中国如何实现发展转型 /71
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 /77
人类发展的协同进化 /85
中国改革起因和发展道路 /87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98
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实力 /107
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 /113
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 /122
邓小平也会支持绿色发展 /132
人才强国与成才之路 /142

怎样认识中国之路的创新	/151
建成世界级创新型国家	/164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背景	/167
当十几亿中国人一起创新	/171
中国崛起与中国之路	/174
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	/186
面向“十二五”的中国	/194
中国如何制定“十二五”规划	/205
中国互利共赢的全球战略	/216
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219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	/230
如何看待中国发展	/244
中国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	/252
中国绿色发展实践	/256
中国绿色发展与中英合作	/262
新亚洲崛起：冲突、成长与新未来	/268
十年内中国 GDP 超过美国	/272
百年中国与中国道路	/276
中国经济发展及外资企业机会	/280
2020 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	/287
2030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304
后记	/307

告诉后代：中国经济 腾飞的故事^①

(2009 年 11 月 1 日)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胡鞍钢教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的这次访谈是“中国经济腾飞项目”的组成部分。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史料。我们希望这份史料能够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帮助那时的研究者理解中国人现在是怎样回头看 1978 年到 2008 年这三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的。因此我们今天希望能听到您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观点。在正式访谈开始之前,能请您先作一个自我介绍吗?希望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您的成长经历。

胡鞍钢答(以下简称“答”)：好的。我叫胡鞍钢,1953 年出生于中国的“钢都”,也就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市。所以“鞍钢”既是我的名字,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同时又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地方。鞍山钢铁集团是“一五”时期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的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1966 年我小学刚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 年我在北京上完初中之后就不得不到黑龙江北大荒的农场去插队,一直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 年,我在华北冶金地质队当工人,适逢邓小平宣布恢复全国高考,于是我参加了高考并幸运地考上大学。1978 年我正式进入大学,一直到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

①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 2009 年 11 月 10 日接受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员李肇华和约翰·德鲁瑞(John Delury)为《中国经济腾飞项目》进行的访谈。“中国经济腾飞项目”(China Boom Project)是纽约亚洲协会正在创办的一个公共教育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录制对中国各领域最有影响力者的访谈视频,以帮助西方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李肇华同时是《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德鲁瑞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

可以说我个人的人生转变也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起先我从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变成工人,后来我又考上了大学,一读就读了十年书,先后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回国。从1989年起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2000年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授,到今天已经将近十年了。可以说,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也是三十年来人力资本的变迁——从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到一名工人,继而成为一名博士,最后成为一名教授。实际上,不仅是我,我的家庭也是这样的变迁:1977年我第一个考上大学之后,我的三个弟弟也陆续考上了大学;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的时候,我这三个弟弟也都已经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学习了;1993年我第一个回来后,两个弟弟也在1998年回国,现在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我们四个兄弟中有两个拥有博士学位,两个拥有硕士学位。可以说,通过我们一个家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巨变——几乎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迅速改变了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状况。所以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时,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更要看到整个社会人力资本发生的重大变迁,我认为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

问:如果我们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作一个回顾,您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比如说最近在美国有一个辩论,有人认为中国80年代有一个发展模式,到90年代又改变为另外一个模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又会如何将这三十年划分为不同阶段呢?

答:我想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过程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第一个历史转折点是在1949年,在这之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一盘散沙、被称作“东亚病夫”的大国。而在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它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启。这段经历可能和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们将1949年到1976年称为“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尽管我们也有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但是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发生巨大变化,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

第二个巨大的转折点是在 1978 年，我们把此后的时期称为中国的经济起飞阶段。根据我提出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大体可以将 1949 年到 1977 年视为准备成长期；从 1978 年以后中国就进入到第二个时期——经济起飞期或迅速崛起期，长达四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直到 2020 年之后，中国将会进入第三个时期——强盛期。这是国家发展的生命周期，我有一本专著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①事实上，当 1978 年中国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期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能够预见到这个变化。直到 80 年代末，我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了。我认为这次经济起飞可能从 1980 年前后开始会持续到 2020 年，也就是持续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并且经济增长率大约会在 6% 到 7% 之间。^②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因为中国的增长率事实上达到了 9.8%，而且时间上比我们预计的要长得多。^③当然，邓小平早就对此进行过设想，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会持续不止二十年。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了从 1981 年到 2000 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两番的长期目标，和到 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期目标。^④我个人认为中国从 1978 年开始的经济起飞至少还可以持续到 2020 年以后，当然 2020 年以后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长率了，而将会从高增长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时期，并且这种稳定增长至少可以持续到 2050 年。可以说，中国将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1949—2050 年），实现从一个文盲充斥、极端落后的贫困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一个真正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的过程。

问：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确令西方世界非常吃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人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担忧。比如在美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还将持续下去；但同时也有一些人批评说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的、环境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您怎

① 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胡鞍钢：《人口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从 1978 年到 2008 年，中国国民总收入平均增速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两项指标均达到 9.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版。

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闻名于世的“三步走”跨越战略。邓小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1 页。

么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问题呢？

答：首先，我认为需要按照一定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此，我提出了以下标准：第一，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增长率长期超过 1% 时，可以认为它已经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入到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第二，如果一个国家人均 GDP 增长率长期超过 3%，就可以认为它已经从低增长模式进入到高增长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增长率长期超过 3% 的国家相当少。从中国的发展来看，从 1949 年到 1957 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实现过一次高增长，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是 9.2%，人均 GDP 增长率已经超过 7%，可以归为高增长。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之后，经济就出现了较大波动，而这一次高速增长时期就此结束。从 1978 年以后，中国又出现了一次高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9.8%，人均 GDP 平均增长超过了 8%，这个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到了今天。^① 总的来看，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实际上长期保持了 9% 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

今后中国还会不会持续高增长？我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讲，中国长期高增长持续到 2050 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② 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腾飞，要将高增长维持到 2050 年，这就相当于中国从 1978 年到 2050 年要保持长达七十年的高增长。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美国也只能保持四十年到五十年的高增长时期（指 1870 年至 1914 年）。从我们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的分析来看，如果中国能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保证长期的高增长就可以实现。

第一是经济上“不折腾”，避免出现像“大跃进”那样的大起大落；第二是政治上“不折腾”，避免出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多次政治斗争的情况；第三是社会上“不折腾”，比如像“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上街游行、包围中南海那样的“大折腾”；第四是生态环境上“不折腾”，包括不砍树、不毁林造田、不毁草造田等，也就是要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最后是“我们不折腾别人”，就是争取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尽量避免在国际社会上树敌太多，比

① 从 1978 年到 2008 年，中国人均 GDP 的平均增速达到了 8.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根据作者的估计，从现在开始到 202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维持在 9% 左右。到 2020 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规模的增加，其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下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增长的时期。但到那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即使下降到 4%，仍属于高增长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会持续保持在 1% 以下，那时的人均 GDP 增长率仍然将超过 3%，在世界上依然属于高增长国家，只是相对历史纪录有所下降。

如1969年党的“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反”，首先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其次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再者是反对各国反动派，其中包括印度政府等。只要做到这五个方面的“不折腾”，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能持续七十年（指1980年至2050年），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问：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主要围绕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展开，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我们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如何区分和处理“两只手”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只手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另一只是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194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设计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就是“两只手”——“大计划加小自由”，实际上就是“看得见的手”加上“看不见的手”，当然是“看得见的手”为主。后来我们学习、引进、借鉴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经验，就从“两只手”变成了“一只手”，只剩下计划之手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尤为突出。1978年以后，邓小平、陈云以及李先念等中国的领导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经过实践以后也感觉苏联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此又重新提出了“两只手”。^①

而后中国政府就不断地深化市场改革。到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有二十八个转型国家，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一只手”变为“另一只手”，也就是从“看得见的手”到“看不见的手”。^②但是中国领导人（指邓小平）则提出：不管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标。^③因此，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1992年）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都设计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路线图，我们把它称为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思路，也称为从

① 当时这被称作“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而且陈云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是“鸟笼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像个鸟笼子，你这个鸟是不能跑出去的。“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② 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一只手”到“两只手”，也就是从计划之手到计划和市场这两只手并用。市场之手，是让市场来配置整个资源；计划之手，是我们所讲的宏观调控。后来政府进一步界定了这两只手的调控范围，政府之手更多地承担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四大职责。

走到今天，我们发现中国模式确实在世界上比较少见，这是“两只手”相互补充、“两只手”相互作用。中国从“一只手”到“两只手”这个模式的转轨是比较成功的。不只中国，其实越南也是这样的。因此中国就避免了在经济转轨后“先下滑、后上升、再恢复”的这样一个大幅波动（大折腾）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而言，“两只手”总比“一只手”好。事实证明，在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两只手”还是比“一只手”好。越是发展市场的那个手，越是需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之手，这就是中国的经验。我想这个经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实际上中国的成功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经济转轨成功，中国要比东欧国家和苏联那些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型要成功；第二个是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如果把中国和印度作一些对比的话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所以我们会更有信心地去不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发展这种“两只手”的模式。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不论是美国模式、英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我认为，这种“两只手”的模式是最适应中国的一个模式。

问：您特别关注环境保护的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情况与改革开放和经济模式转变都有怎样的关系？怎么理解这种关系？环境问题对于中国的将来有什么影响？

答：谈到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提出的“猫论”。邓小平曾经在60年代初期提出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①但这个“猫论”既有合理性与进步性，也有不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个

① 邓小平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猫论”指导了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我们需要第二代“猫论”——猫的颜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从“黑猫”（黑色中国）能够变成“绿猫”（绿色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煤炭消费最多的国家，2008年已经占世界总量的42.60%。^①中国还是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国家和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变成了一只“黑猫”。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但中国制造的污染不仅威胁了自身利益（中国人自己是污染最主要的受害者），而且也危害了全球利益。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第一代“猫论”已经不足以应对我们目前的挑战，我们需要第二代“猫论”，需要与时俱进，从“黑猫”变成“绿猫”。这对我们有好处，对全世界也有好处。

过去我们对全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第二是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第三是对全球贸易增长作出贡献。但是今后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希望中国在继续作出这三个方面贡献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作出另外三个方面的新贡献：绿色贡献、知识技术贡献和文化贡献。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21世纪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污染的挑战，应该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转化为一种文化，使之成为全世界都愿意接受的一种文化，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学习邓小平创新的“猫论”，也要超越邓小平，提出新的“猫论”，即“绿猫论”，这才更符合中国发展的自身需求，更符合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要求。

问：您刚才提出的这种绿色发展理论，也就是“绿猫论”，同目前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这是不是就是和谐社会的含义呢？

答：和谐社会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是我们所说的“绿猫论”。第二个和谐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今天我们需要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第三个和谐，就是和谐亚洲、和谐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最重要的是变得越来

^① 2008年中国煤炭消费量达到14.063亿吨，占世界总消费量(33.037亿吨)的42.60%。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http://www.coalchina.org.cn/page/info.jsp?id=17979>。

越紧密了。那么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发生冲突就可能殃及全世界，因此我们还是主张一个和谐世界。构建这样的一个世界，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从这三个意义上来看，才能全面理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概念。这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对中国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对全世界来讲，我认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文化和中国现在的经济起飞是什么关系呢？中国的文化，就如同长江之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而经济发展，则是长江之水，会曲曲折折，最终长江之水波涛滚滚，后浪推前浪，后浪超前浪，都要流入（融入）大海，这个大海就是经济全球化，就是全世界。我们（中华文明和中国经济）最终都要融入到全人类和全世界之中。因此我觉得和谐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问：您认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腾飞，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四个方面的创新。第一个创新是理念的创新，就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猫论”，使得我们更加务实地去发动整个中国的改革。他还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说改变了所有人的理念，也改变了中国。第二个创新是制度创新，因为中国一开始建立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存在很多弊端，后来就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制度，而且还加入了宏观调控等手段，从而把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是简单的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复制，而是对西方的超越，是中国的创新。第三个创新是市场创新。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发展起来一定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就算是在三年前我们都不能想象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和生产国，将来甚至也可能成为最大的出口来源地。第四个创新是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引进消化吸收外国技术，而后不断地创新自己的技术，将来中国还有望能够进一步出口技术。事实上，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额一直高于高技术出口额，而2005年以后，就变成高技术出口额超过高技术进口额，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创新不仅推动中国的经济腾飞，也能够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能够不断地去推动全世界的知识技术创新。这四个方面的创新是相互联系的，既解释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故事，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敢说未来三十年到四十年中国仍然还会持续腾飞。

问：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令人振奋。您认为中国的未来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答：首先，我想再次回顾一下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战略。在二十多年前（指1987年），邓小平就预测过中国的未来。他曾经预言：“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指20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那时，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邓小平提出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在2020年前后就能够提前实现了。因此，我们既需要邓小平的这种战略，但同时也需要超越邓小平。我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现代化要超越邓小平所说的基本现代化，而是要进一步实现中国的“绿色现代化”。

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共同挑战是气候变化，从1750年到2000年，从蒸汽机的工业革命到电力的工业革命到信息工业革命，都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情况。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面临一次新的绿色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中国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现在应该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来发动这场绿色工业革命，到2050年实现绿色现代化。

绿色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到2050年全世界的碳排放要比1990年水平减少一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希望到205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下降到1990年的一半。如果中国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能做到；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全世界也同样做不到。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中国的一个世界定位，中国在提前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中等发达水平”的基本现代化目标之后，应该继续前进，实现绿色现代化。只有实现了绿色现代化，中国才真正能够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

问：您的回答非常精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中国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①

(2009年12月21日)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胡教授,您好!今天非常希望能向您请教一些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问题。您在这方面有许多研究,特别是今年您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②您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在2010年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基于怎样的研究和分析,您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呢?

胡鞍钢答(以下简称“答”)：根据我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生变化的原因既包括领导人对人口问题判断的变化,也包括人口学家对人口问题变化所作的判断。综合这两个方面,我认为人口政策在中国进入2010年后会有所改变。

首先,早在50年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就在人口政策方面提出了建议。1957年,马寅初就首先提出“一对夫妇,两个孩子”的人口生育政策。^③同年,孙本文提出了中国人口规模为8亿的宏观目标,但没有明确指出实现这一人口规模的时间。^④我认为,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生育政策非常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非常遗憾,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采纳这个政策建议并付诸实施。

中国领导人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组织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其中包括了《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认为中国政府无法解决过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必然会因此“天下大乱”。当时,毛泽

① 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于2009年12月21日接受美联社北京分社记者的采访录音稿整理。

② 胡鞍钢：《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经济参考报》，2009年11月26日。

③ 1957年7月1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倡议“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人口生育政策，对符合这一标准的家庭进行奖励。

④ 孙本文于1957年发表《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首次明确回答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人口研究》编辑部：《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人口研究》，2002年7月，第四期，第26卷。

东针对艾奇逊的这种“中国人口压力论”提出“人多好办事”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① 但到1957年,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口众多与资源紧缺,人口迅速增长与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导致劳动力队伍形成巨大的城乡就业压力,毛泽东被迫改变了“人(口)多是好事”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明确地提出控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1973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计划会议上第一次将人口指标列入国民经济计划。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人口太多”。同年他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② 之后,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开始实施,当时所提出的政策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人继承了上一代领导人控制人口的观点。1979年,在意识到人口众多形成的发展压力后,邓小平提出人口问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并开始推动“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一政策最初只是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实施,^③当时还不是强制性的政策,而是激励性的措施。但随着粮食、房屋、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不断受到人口数量的挑战,1980年中国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因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婴儿潮在80年代转化为相互重合的两次人口生育高峰,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当时中国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控制总人口的目标,并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④ 在这个政策实施

①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9—1516页。

② 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③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④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20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1982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把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明确为: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之后，中央政府收到了大量的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农民的反对意见。因此后来政府又同意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农民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1985年，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将人口与发展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基于我的估算，在80年代时期，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在2.7—2.8之间，远远超过学术界普遍认同的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根据我的预测，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会相继迎来三大人口高峰：2020年达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2030年迎来总人口高峰，2040年迎来老年人口高峰。三大人口高峰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持久而巨大的压力。^①

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所得出的结论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邓小平评价这个政策是特殊时期的产物，针对的是特殊的一代人。这意味一代人必须为中国人口的控制作出贡献，作出牺牲，“舍小家，顾大家”。江泽民执政后坚持了邓小平的政策。在1991年之后一直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严格实施。^②从1991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每年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召开各地区党政一把手人口和计划生育座谈会，而后改为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开始迅速下降，1990年代降至2.1以下。^③从1995年开始，中国0—14岁少儿人口已经达到33400万人的顶峰，此后持续下降。2015年之后，中国15—59岁年龄段劳动人口也会开始下降，到203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生育政策共实施过两次，一次是毛泽东在1973年开始实行的“一对夫妇，两个孩子”的政策，一次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两代领导集体实施的“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次政策实施一直延续到现在。每个政策有收益也有成本，在这一计划生育政策最初实行时，收益远大于成本。到现在，收益已经与成本持

① 胡鞍钢：《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28页。

② 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该《决定》首次规定了“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③ 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1990—1995年期间中国TFR为2.01，1995—2000年期间又降至1.80。见 <http://esa.un.org/umpd/wpp/unpp/pzkodata.asp>。